

8

WENXUE
PINGLUN
CONGKAN

文学评论

丛刊

I206
9
(8)

文学评论丛刊

第八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现代文学专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文学评论丛刊

第八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99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4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43 定价: 1.20元

目 录

郭沫若世界观中的泛神论问题·····	谷辅林 (1)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之一·····	吴功正 (23)
郭沫若五四时期美学思想初探	
·····	郭基瑞 王锦园 (41)
一部现实主义的喜剧	
——论《北京人》·····	田本相 (68)
叶绍钧论·····	曾华鹏 范伯群 (100)
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主观色彩·····	许子东 (130)
试论《山雨》的现实主义成就	
·····	吴松亭 周劭馨 (146)
从“怡情”到“养性”	
——许地山文学创作初探·····	马以君 (160)

试论胡也频的创作	王保生 (182)
试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朱德发 (210)
略论现代散文的发展	方 铭 (236)
契诃夫与鲁迅的前期小说	王富仁 (258)
《药》、《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	叶德裕 (289)
论《故事新编》的性质与思想艺术特点	李正平 (310)
《铸剑》的主题思想及其它	周凡英 (327)
关于茅盾生平的若干问题	叶子铭 (342)
茅盾的长篇小说《锻炼》	树 玉 (378)
殷夫生平的一些新史料 ——纪念殷夫烈士诞生七十周年	肖 荣 莽 砂 (383)
《萧红传略》中的几个问题	刘大平 铁 峰 (402)

郭沫若世界观中的泛神论问题

谷 辅 林

关于郭沫若世界观中的泛神论问题，目前众说纷纭。但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认为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时的“思想武器只有泛神论”^①，一是认为泛神论只是作为对郭沫若早期思想和作品起影响作用的一种“因素”，而且这种“因素”“是处在不断削弱和逐步消亡的状态之中”^②。两种意见，相距甚远，它关系到对郭沫若早期思想发展及其创作成就的认识和估价问题。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正确地解说，就成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郭沫若接受泛神论究竟始于何时？他为什么会接受泛神论？泛神论在郭沫若世界观中开始怎样，后来怎样，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有助于理解和估价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的成就。

郭沫若接受泛神论始于何时？这是研究郭沫若泛神论思想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在他的诗作《三个泛神论者》

① 楼栖：《论郭沫若的诗》第9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② 顾炯：《〈女神〉与泛神论》，见《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中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 Pantheism（泛神论）”。这是有些人研究郭沫若泛神论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此说能成立，那末，郭沫若在未出夔门之前的少年时代就接受泛神论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庄子是不是泛神论者。为要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对泛神论的概念及其来源作一扼要的说明和回顾。

泛神论是人们在反宗教、反神学的斗争中出现的一种学说。它认为宇宙本体即是神，神即自然。或说神与宇宙同一，或说宇宙与神同一。它的出现，对于一神论或多神论都作过有力的驳斥。

泛神论这个词是罗马天主教徒约翰·托兰一七〇五年首先使用的^①。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却早在古代的欧洲、印度等国的哲学史上就有了。比如九世纪的罗马人约翰·司各脱·厄里乌根纳在他的著作《论自然区分》一书里，就有摈大自然和神等量齐观的意图，明显地表现出泛神论的动机^②。十世纪的伊朗曾出现了一个思想派别叫苏非派，为了反抗宗教压迫，他们否定真主是超验的彼岸的本质，肯定真主是自然界内在的本质，是万物的总和，甚至认为真主就是我，就是我们^③。十二世纪的格鲁吉亚人肖泰·卢斯达维里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的，神是“万物的总体”^④。到了十五世纪德国的库斯的尼古拉提出“神在万物中，万物在神中”的观点^⑤。差不多同时，印度的加皮尔则宣传“一切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主张人的灵魂与上帝合一的“天人一致论”^⑥。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之一

① 《英国百科全书》(英文版)1911年第11版，第20卷，第682页。

②③④⑤ 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第303，232—234，273—274，327—32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⑥ 《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1964年版，第13卷，234页。

的托马斯·闵采尔认为天堂和地狱不在彼岸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中，认为基督同我们是一样的人^①。稍后，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则提出“自然界是万物之神”的著名论点^②。到了十七世纪荷兰的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提出一个典型的泛神论的说法：“神或自然界”^③。由于斯宾诺莎的影响较大，因而泛神论思潮通过他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泛神论实际上是在神学外衣掩护下的一种无神论思潮，也可以说是有神论向无神论过渡的一座桥梁。由于它把神等同于自然、万物、常人，因而使宗教失掉了神圣的特异的光彩，成了极为平凡的东西。这是对信仰主义欺骗的揭露和反抗，为无神论思潮的勃兴，创造了思想条件。敢于同宗教展开斗争的人，往往是先从亵渎神灵开始的。因此，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一样遭到反动宗教力量的仇视与迫害。布鲁诺为宣传和坚持泛神论被反动宗教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④；伊朗的曼苏尔·阿尔因为说一句“我的皮袄里只有安拉”（伊斯兰教的真主谓之安拉，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自己是真主）而惨遭杀害^⑤。正是有为了思想解放而反对宗教反对神学的先驱者们的浴血奋斗，才有助于促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建立，才有助于无神论学说在世界上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泛神论在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斗争中，在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没有泛神论这个概念。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的庄周，是一位著名的道家。他认为“道”是宇宙本体，是永恒的存在。他认为“道”“莫知其始，莫知其终”，“神

① 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55 页。

②③④⑤ 同上，第 357—361，448—450，357—361，232—234 页。

鬼神帝”，生天生地”^①。他还认为人如果精神得“道”，即可与“道”同体，于是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的名言。在庄周看来，有了这种“道”，便可以打破一切差别，与万物同体，而超脱时空。他认为“一切都是‘道’，一切都是我”^③。这种主张“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道”的特点与泛神论确有相似之处。也可以说庄周是泛道论者。因此，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的诗歌中把庄周的泛道论误当成泛神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仍然根据作者的诗歌说什么“郭沫若爱的是《庄子》本身固有的泛神论”^④那就不合适了。因为，郭沫若本人后来也作了新的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比如，郭沫若在他的《庄周的批判》一文中，对庄周进行了颇为公正的历史评价，但他不再认为庄周是泛神论者。所以，我们如果要从郭沫若的言论本身找根据，则应以《庄周的批判》一文为适当，而不应该仍然根据他的《三个泛神论者》。因为，前者是科学论文，是郭沫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写的；后者是诗歌创作，是郭沫若思想相当复杂时写的。所以，郭沫若接受泛神论的时间就不是接受庄周影响的少年时代。那末究竟始于何时？我们认为应该始于一九一五年他得到泰戈尔的《新月集》的时候。那时候，郭沫若是很兴奋的。特别是到了一九一六年秋天，当他进一步得到泰戈尔的《曷檀伽里》《园丁集》《暗王室》《伽毗百吟》等书的时候，泰戈尔的那种“泛神论的思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使他感到“享受着涅槃的快乐”^⑤，“因为喜欢泰戈

① 《庄子·大宗师》。

② 《庄子·齐物论》。

③ 郭沫若：《庄子的批判》。

④ 李保均：《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⑤ 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接近了”^①。这是郭沫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自我写照。因此，郭沫若最早接受泛神论的时间应该以一九一五年为起点。

二

郭沫若为什么会接受泛神论，这是有他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的。郭沫若早在幼年上学时，就在读经之外又接触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思想。他崇拜过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喜欢过梁任公的《情议报》^②，他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产生了一种憧憬，幻想着恋爱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庄子》的那种汪洋恣肆、浩浩渺渺的气势也使他产生过亲切感。可是当时那种混浊的现实又使他感到压抑。他上中学时，曾在一次考试中获得全校第一。他年龄小，又不很用功，反而得第一，这使得一些大同学产生了无名的嫉妒和恼怒，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学校竟以他端午节请假回家为借口扣了他总平均成绩六分，把名次降为第三，这才平息了风波。这次事故使他发现了人性的阴暗面。他反感、憎恨，并进而产生了反抗的心理。郭沫若说，这是他思想发展中的第一个转折点^③。

向往民主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萌芽，是他后来接受泛神论思想的内因。泛神论的那种蔑视神灵及一切权威的宽宏气概正是他早就渴求而不可得的一种精神支柱。

国家的积贫、黑暗、腐朽，引起当时广大爱国者的深切关注。“富国强兵”的口号曾经风行一时。稍有鸿志的人，都想学

① 《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

② 《沫若文集》第6卷，第112页。

③ 《沫若文集》第7卷，第3—4页。

习实际的学问来贡献给国家。郭沫若深受这种爱国思潮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炮声，曾经给他带来热切的希望。他曾经为那场革命热烈地欢呼、奔走。对孙中山、黄兴等国民革命的领袖，他曾经崇拜过。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是它的历史功绩。然而，它很快就夭折了。满人皇帝下了台，实际上由汉人皇帝袁世凯取而代之。袁世凯一上台，就在帝国主义和国内顽固势力的支持下，大搞复辟活动。尊孔声浪，喧嚣一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堕落为保皇派的康有为，在他办的《不忍》杂志上大肆吹捧“孔教主义”，攻击国民革命，提出“欲定国教，惟有尊孔”^①的谬论。曾经是介绍西方文化提倡维新的主要人物严复，此时也投身到袁世凯的幕下，倡导帝制。帝俄分子盖沙令也大叫“孔教者，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国家性命之所托，舍孔教奚属哉。”^②在这股尊孔复辟的逆流面前，曾经参加甚至领导过辛亥革命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发生了很大分化，有的变节，同复古派合流，有的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对于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③中国人民依然在受难，数万万同胞仍然挣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皮鞭下，辗转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更加贫困落后的祖国象风雨飘摇中的破船一样，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贪婪鲸吞的黑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资料》（下），1977年印，第275—277页。

② 同上，第275—2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风恶浪中，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此情此景，使得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郭沫若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祖国的出路何在？郭沫若超越不了当时的时代局限，他也只能为富国强兵而努力寻求。他虽然自幼倾向文学，但为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路，便决心弃文学医，以便用医学“报效国家”。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郭沫若“出了乡关，出了国门”^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要去寻觅能使祖国新生的“太阳”^②。他于一九一四年初到达了日本。从此，他一去数十年而不曾回乡。母死未曾奔丧，兄亡未能临葬。他成了旧家庭的不孝子，也成了旧国家的叛逆民。

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郭沫若才有接受泛神论的可能。周扬曾经说过：“回顾一下我们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那时我们急迫地吸收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限。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③郭沫若刚到日本时的思想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富国强兵，他急不可待地吸收着一切他能接受的新思想。而泛神论便是他走出国门之后首先碰上的一种新思想。

泛神论虽然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早已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谢林、黑格尔等用作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工具，但是对当时的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未介绍过来，由于封建宗教迷信思

① 《沫若文集》第7卷，第57页。

② 参见：郭沫若：《女神之再生》（结尾部分）。

③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想正在泛滥，因此，在反对封建宗教、提倡科学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泛神论思想就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当时的中国及其爱国的知识分子就有很大的吸引力。郭沫若之所以一接触了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就产生了“莫大的牵引”，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三

泛神论在郭沫若世界观中有一个从潜伏、暴发到逐渐消失的发展过程。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秋，是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潜伏期。所谓潜伏期，即未曾作用于社会的时期。郭沫若自己说过，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前“我的诗，乃至任何文字，除抄示给几位亲密的朋友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①

郭沫若之接受泛神论，就好象久旱的禾苗突然遇到雨水一样的甘美，又好象暗夜中大海里的航船突然发现灯火一样的喜悦。他贪婪地阅读着具有泛神论思想倾向的泰戈尔的诗，又从“在少年时代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②，他欣赏着“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③的那幅自集的古语对联。那时候，他整个灵魂好象已经浸泡在泛神论的泉水里了。他曾经因陶醉于泛神论而发展到很危险的地步，“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④。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五四运动暴发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泛神论思想好象一条彩绳似的时紧时松地缠绕着郭沫若的身心。他时而兴奋，时而苦恼，时而绝望，如醉如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①②③④ 见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

他一接触到泛神论便感到自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好象立即可以毁灭旧世界，使祖国新生、使世界变貌似似的。可是他那个与“上天下地同流”的力量，只是一种内发的，好象是地下的火焰，火山爆发前的岩浆，暂时还不能触动客观现实的一丝一毫，不能立即拯救自己的祖国，这就好象一个自认为力大无比的拳师在冷漠的荒原里有力使不出一样的寂寞、悲哀。这阶段的思想在他的行进中已经留下了痕迹。首先表现在他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精神方面。具有泛神论思想的人，大都同时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惠特曼如此，歌德如此，泰戈尔如此，郭沫若也如此。比如有这样一首诗：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这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为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条件郭沫若随同学回国后写的。诗的前四句写诗人对日本无理提出二十一条条件要中国承认一事表示与天齐的冲冠大怒，并表示如果谁敢侵犯祖国，他就要投笔从戎参加战斗消灭侵略者。这就是他当时所以要回国的思想感情。可是结果并不理想，诗人到上海客栈住了三天便又跑回日本，一起回国的那些同学中，有的在活动着做官，有的空空洞洞地写一些感情文章，有的天真一些的青年则热心地四处宣传。这种情况使得诗人感到无比失望。诗的后四句便是反映当时失望的心情。他的爱国的理想和行动受到了“当头一棒”，醉梦似地破灭了。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的形象在诗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又比如《晚眺》这首诗：

暮鼓东皋寺，鸣箏何处家？

天涯看落日，乡思寄横霞。

这是一九一六年诗人在冈山六高学习，月夜到学校附近的东山之阴去独自徘徊时写的。他耳听着日本东山寺的鼓声和不知来自谁家的箏鸣，眼看着落日处的天涯云霞而依依思念自己的祖国。爱国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帝国主义的欺凌，封建主义的黑暗腐朽已使郭沫若愤慨万分了，又加上曾经主张“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一些人中有的中途变卦，有的升官发财，有的灰心丧气，表现出中国国民精神的极其麻木。于是郭沫若再也按捺不住他那火一般的热情，再也不能冷静地从事于医学的学习和研究，他终于走上鲁迅曾经走过的路，决定弃医就文了。一九一八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实绩，一九一九年春，郭沫若便继鲁迅之后写出了小说《牧羊哀话》。其中借大韩遗民闵崇华的名义写下了《怨日行》这么一首诗：

炎阳何杲杲，晒我山头苗。土崩苗已死，炎阳心正骄。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潮？安得鲁阳戈，挥汝下山椒！羿弓鲁戈不可求，泪流成血洒山丘！长昼漫漫何时夜，长恨漫漫何时休！

这里的炎阳，不是天上的阳，而是日帝的“日”。面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欺压蹂躏，诗人多么急切地盼望打倒帝国主义，解放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这种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在一九一九年的作品里表现出来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高度及其坚决革命的精神。然而，诗人却是噩梦一场，“泪流成血

洒山丘”。最后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表示出无穷的忧虑和哀伤。

象这样一些诗篇，其他一些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也可能写出来；然而，对于当时的郭沫若来说，却不得不同他的那种强烈地蔑视一切、反抗一切权威和偶像的泛神论思想紧紧地连在一起。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使郭沫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接受了泛神论；而泛神论思想一经接受下来便又增强了他的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精神。郭沫若能在五四运动之前乃至在十月革命之前写出上述那些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诗篇，是同泛神论思想对他的支持和鼓舞密不可分的。

其次，表现在他追慕自然和追求爱情自由方面。当诗人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受到挫伤的时候，诗人便又在自然与爱情中寻觅他的精神寄托。一九一六年十月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怪石疑群虎，深松竞奇古，我来立其间，日落含山斧！血霞泛太空，浩气荡肺腑，放声歌我歌，振衣而乱舞——舞罢道下山，新月云中吐。”这首诗通过描写傍晚的山景及诗人狂歌乱舞的形态，反映了诗人当时愤世疾俗的心情，通过对自然的抒怀，寄托着诗人一时空虚的心田。追慕自然，景仰自然，借以摆脱神学及一切偶像对自己的束缚，这是泛神论者的共同特点。郭沫若也不例外。这在他以后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朗。古今中外，描写自然的作品浩如烟海。然而，作为具有泛神论思想的人去描写自然则带有泛神论者主张“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浓厚色彩。

除自然外，诗人还描写爱情。郭沫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恋爱自由，但在那个异域异族的国度里，中国人是深受歧视的。然而诗人居然得到一位日本姑娘的爱。这位姑娘为

爱他竟然不顾“破门”^①的处分，这使他深受感动。这爱情促使他翻译了泰戈尔、海涅等人的爱情诗，同时也自写了《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等爱情诗。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陶醉于爱情的同时，也表露出内心深处的苦痛。如果从《维奴司》这首诗看，诗人的整个身心好象都沉醉在爱情里了。什么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他统统放在脑后了。诗人写道：“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这样的诗在当时的封建卫道者们看来，简直是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诗在当时的中国，只能产生在具有坚决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手里。而泛神论思想是促成郭沫若把他的反抗性格大大向前发展的重要助力。这样的诗能在“五四”时代产生，固然不失为反封建的一种进步倾向。但毕竟显得过于轻松、浮泛，缺乏革命的冲击力。究其原因，显然又是那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理想不能满足时的一种自暴自弃式的自我陶醉。

再次表现为消极反抗的精神。泛神论者蔑视神灵和一切偶像。然而在现代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中国，这种停留在意识上的蔑视是不能收到什么社会效果的。尤其是当时的郭沫若，他留学日本，远离祖国，尽管他的内心有天大的不满，又何济于事！所以，当他在不断追求真理、追求理想而又追求不到的时候，便又失望、悲哀、甚至想到死。“是我意凄迷？是天萧条耶？如何春日光，惨淡无明辉？如何彼岸山，低头不展眉？周遭打岸声，海兮汝语谁？海语终难解，空见白云飞。”（《春愁》）忧愁迷离之情，渗透在字里行间。“我有一把小刀，

① 海英：《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63年3期。